

[美] 弗农·阿·沃尔特斯著

秘密使命



秘 密 使 命

〔美〕弗农·阿·沃尔特斯著

尤颢 朱州 胡晓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Vernon A. Walters

SILENT MISSIONS

Doubleday & Company, Inc., Garden City, New York

根据美国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 政

秘 密 使 命

〔美〕弗农·阿·沃尔特斯著

尤 懿 朱 州 胡 晓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阜成门外展览路24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7.25 插页：1 字数：167,000

1980 年 7 月第 1 版 198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1—18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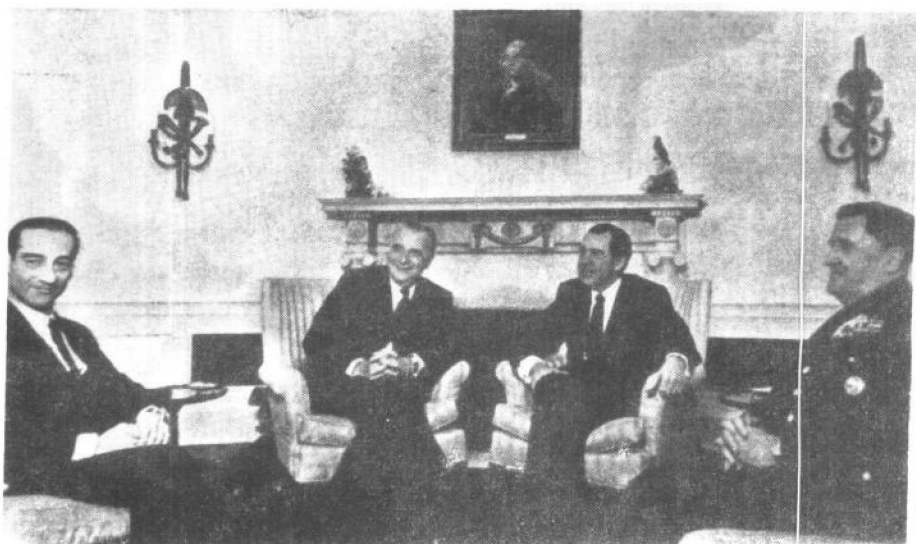
书号：3003·1607 定价：0.76 元



一九五一年，
陪同哈里曼在德黑
兰会见摩萨台。



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在巴黎凯旋门。



一九七〇年，尼克松总统在白宫会见蓬皮杜总统。



一九七六年，
基辛格祝贺沃尔特
斯获得国家安全勋
章。

出 版 说 明

本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副局长弗农·阿·沃尔特斯的回忆录。

作者从五十年代起，曾担任美国历届总统翻译，并陪同他们多次参加首脑会议和其它重要出访活动，还曾陪同马歇尔、哈里曼等政界重要人士参加一些外交活动。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二年，在他担任驻法国武官期间，奉尼克松总统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之命，负责安排美国与中国、越南的秘密谈判。

我们选择本书中有关外交活动及其它重要事件的章节，辑录翻译出版。书中所描述的都是历史上关键时刻的情况，作者以其亲身经历提供了背景情况、侧面材料以及外交场合的趣闻、秘闻等，具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本书根据美国纽约花园城双日出版社一九七八年版译出，在翻译过程中，若干章节和段落，我们曾参考法国普隆书店法文译本。

目 录

一、哈里曼与马歇尔计划	
——为重建欧洲而工作·····	1
二、随同杜鲁门总统去威克岛	
——杜鲁门和麦克阿瑟的会晤·····	19
三、陪同艾森豪威尔将军访问北约各国	
——十字军重新唤起了希望·····	27
四、摩萨台与哈里曼的故事	
——解决石油问题未成·····	44
五、陪同艾森豪威尔总统出访	
——日内瓦、百慕大、巴拿马、白硫泉最高级会谈， 为了和平而奔走·····	65
六、陪同尼克松副总统访问南美	
——利马和加拉加斯的暴力行动·····	98
七、关于U-2飞机的会议	
——赫鲁晓夫暴跳如雷·····	122
八、肯尼迪总统访问巴黎	
——我为什么没有完成任务·····	132
九、在巴黎担任武官	
——花絮拾零·····	136
十、与北越秘密会谈	
——“干掉阮文绍！”·····	163

十一、与中共秘密会谈	
——二十五年后又言归于好.....	179
十二、陪同尼克松总统出访	
——支持美国的越南政策.....	199
十三、半夜营救基辛格	
——“告诉他们，这件事涉及一位女人！”.....	215

一、哈里曼与马歇尔计划

——为重建欧洲而工作

六年战争使整个欧洲陷于瘫痪。德国的长期占领，盟军的轰炸和解放前夕的激战，几乎把这个大陆摧毁殆尽。一九四八年，笼罩着欧洲的气氛只是一片绝望。历届政府接踵倒台，持续不断几个严冬，特别是欧洲人深感不能从这个泥潭中自拔的心情，严重地动摇了欧洲各国人民复兴本国的决心。

欧洲工业设施被摧毁，大批熟练工人由于战争而四处分散；经历了六年紧张的战时生产，机器设备已经破烂不堪，而且缺乏零件；所有这些问题使欧洲各国无法自行补充机床，更新设施或生产足够的商品来偿付恢复工业所需要的原料。可以作为新的投资或用以重建工厂的资金少得可怜。大部分欧洲货币不是不能兑换，就是按完全不合理的汇率兑换。对货币流通实行财政限制的情况几乎普遍存在。各国都企图关起门来自己搞建设，对于邻国在干些什么都不很关心。战争已结束三年，食物还几乎到处都实行配给。由于交通中断和分配制度失灵，农业机械化不足和肥料短缺，欧洲各国经济的生产率普遍下降。

美国一直以某种权宜的和紊乱的方式，直接或通过国际组织向欧洲提供食品、货物和金钱。在许多国家里，普遍存在的经济困难还引起一系列政治问题。在希腊，共产党人曾企图用武力夺取政权，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希腊共产党这一企图，得到了邻近共产主义国家的支持。土耳其受到庞大邻国苏联的巨大压力，压他

们在领土方面作出让步，并对苏采取更友好的态度。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方案。这两个国家既受到某种形式的军事压力，又面临很多经济上的困难。两党对杜鲁门总统这一方案的支持确保了它获得国会的批准。当时在美国，人们普遍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自由不仅受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威胁，而且还受到军事威胁。美国政府内部还从那个方案得出这样一种看法，即：如果欧洲要想复兴，就必须建立在一个宏大规划的基础上，这个规划要使欧洲各国更加团结，在美国密切配合下为其共同利益而努力奋斗。

一九四七年，由马歇尔将军首先在哈佛大学一次演讲中，提出了这个以后用他的姓氏命名的计划。该计划为美国和那些愿意参加制订一项援助计划的欧洲国家，提供了一个广泛合作的组织基础，通过这项援助计划，可以使我们的欧洲伙伴得以复兴和自立。欧洲自由国家热烈地欢迎这个主张。苏联则阻止其盟国参加。为配合美国的欧洲复兴计划工作，成立了一个欧洲国家组织。美国在巴黎设立了一个总办事处，同欧洲国家一起来制定执行方案和分配美援。美国前驻苏、驻英大使、前商务部长艾夫里尔·哈里曼被任命为该办事处主任。他要求把我派到他那里去工作，我就被派去了。

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活动即将展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一个国家，即美国，去资助它的竞争者，回过头来再同它竞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奉命执行马歇尔计划。

当我到达华盛顿时，我发现没有必要匆匆忙忙离开里约热内卢。事实上，我是被安排搭乘贾勒特·赫德尔斯顿号军舰赴欧洲。该舰原定十一天到达不来梅港，由于海上遇到风浪，十五天才到。到了不来梅，只见码头附近，乃至整个城市，到处满目疮痍，这

使我感到非常吃惊。战争好象不是三年以前，而是前一天刚结束似的。我乘北方特别快车到巴黎，这是当时在欧洲很少几列国际列车之一。到了巴黎，在找到住处以前，我一直住在香榭丽舍大街附近的加利福尼亚饭店。

到了巴黎，我就向哈里曼先生和我新的顶头上司陆军中校查尔斯·博尼斯蒂尔报到。查尔斯是无任所陆军武官。我们的办公室都在协和广场塔莱朗饭店的二层楼上。这是一座在某种意义上同广场那边的美国大使馆对称的楼房。这座具有历史意义的楼房过去是那位著名的法国外交部长塔莱朗的住宅，当时用来作为美国在欧洲执行复兴计划的总部，直到很多年以后，美国驻巴黎总领馆接收过去充当馆址。至今它仍归总领馆使用。

接着，我着手找一套住房，终于在拉纳大街找到一套很精致小巧的公寓，从这里可以俯瞰布洛尼公园。有了住所，我就返回不来梅去取汽车，把它开到巴黎。一九四八年七月那段漫长的炎夏日子里，我看到欧洲依然处于瘫痪状态。战争带来的破坏和冲击仍然到处可见。仅有的一线光明就是美国明确表示，它决心要帮助欧洲朋友依靠自己的力量恢复他们的经济，使之稳定，并协助欧洲朋友为他们本国人民提供一个比共产主义所许诺的一切东西都好的自由生活。我曾在许多非军事性的活动方面为哈里曼先生效劳。我常常同他一起进行广泛的旅行，走遍了所有的马歇尔计划国家。在他同各国政治和劳工领袖以及金融专家或其他高级人士会谈时，我经常当他的翻译。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非常受教益、感兴趣和有收获的阅历。它开阔了我的视野，并使我有幸得以接触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和金融等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的问题。有时搞得我很紧张，因为我必须翻译某些比较复杂、而我并不完全理解的金融或货币兑换等问题，而要把你自己不明白的东西恰如其份地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是不大可能的。许多人认为搞这种翻译是一项单纯而

机械的工作。如果你对某个人的意思不能完全掌握和理解，那么要用另一种语言来转达是办不到的。广泛的旅行使我有可能在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法国和意大利等实际上所有西欧各国，亲眼目睹了那些战痕累累的断垣残壁。我看到许多城市依然是一片废墟，好多工厂不开工，寂静无声，机器有的已被毁坏，有的已不知去向。巴黎这个不夜城，由于没有原料，又搞不到石油产品，晚上一片漆黑。路灯只开一半，而且光线微弱。所有的商店橱窗或剧院大门都不见灯光。但比利时的情况要好得多。有一次，我临时开车到布鲁塞尔去，越过边界时，我一下就被比利时境内蒙斯镇上万家灯火的景象怔住了。我从一家面包店前面经过时，看到橱窗里摆着涂满奶油的蛋糕，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刚从巴黎来，那里连面包都是配给的，奶油是不准用的。我走进店去以试探的口气问一位面包师傅，橱窗里边的东西是不是配给的。他说不是，我就要了一份奶油蛋糕。蛋糕的味道真好，我又要了一份。那位比利时师傅面带讥讽的表情看着我，并对我说：“你刚从法国来？”我说是的，我以为他不过问问我刚从什么地方来。我忘了长期以来，比利时人一直是许多法国人开玩笑的嘲弄对象，玩笑的内容不外是比利时人怎样愚蠢，又是多么土气。所以当我回答说刚从法国来时，他就露出得意的神情对我说：“比利时有点不一样了吧？”我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那天晚上我到布鲁塞尔已是深夜，使我吃惊的是，布鲁塞尔全城灯火通亮。人们到处都在辛勤地劳动和进行恢复工作，比利时似乎正在带头使欧洲跳出战后的泥坑。我发现，在比利时，不论是食品还是肥皂，或者其他我在巴黎已习惯于用配给券购买的任何东西，都不是配给的。必须承认，在阴霾和黑暗笼罩下的欧洲，我发现比利时与欧洲各国截然不同，它是一座繁荣兴旺、一切正常并受人欢迎的孤岛。后来它成了欧洲共同市场的所在地和欧洲大陆的“心脏”。

现在，事隔多年以后，许多人都已经忘记，一九四八年是一种什么局面。他们忘记了我们当时从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那就是资助我们的竞争对手，使他们复原以后再同我们竞争。马歇尔计划开始执行才短短几年，欧洲的工业机器重新转动了。在旧世界被战争摧毁了的国家面前，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和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新气象。无论是我们的盟国还是我们的敌国，都在各个方面得到了我们的援助，这种援助的规模是人类历史有文字记载以来决无先例的。人的记忆是短暂的，但是作为一个当事者，我不能忘记，为了欧洲的自由和繁荣，我们曾不惜牺牲，并付出代价，首先在战争年代献出了我们的人，接着，在和平时期又拿出了我们的财富。虽然我说许多人已经把这一切都忘记了，但并不是到处如此。事实上，有些地方的人理解并感激我们。但不少人认为，整个复兴计划只是美国推销商品的一种巧妙办法。如果说大众牌汽车厂、菲亚特汽车厂、雷诺汽车厂都能很快恢复生产大批车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援助了他们，为他们提供了重新进行生产所必需的机床和设备，而这些东西当时在欧洲是搞不到的。

在荷兰，我在一家面包店看到一张荷兰政府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招贴画，上面写着：“每天吃的面包有一半是靠马歇尔计划的援助烤出来的”。奥地利为旅游业添置的各种设施，也归功于马歇尔计划。但是总的看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还是难以使一般欧洲人理解我们当时提供援助的规模有多大，以及我们在提供援助时所持的无私精神。不错，我们曾希望欧洲国家繁荣起来，并从我们美国购买东西，但这不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宗旨。它的主要宗旨是，给予我们在苦难中生活的朋友、盟国和先前的敌人以帮助，从而阻止共产主义乘人之危向前推进。

提供援助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的。在受援国方面同样需要作出详尽的计划。他们必须向我们提出一个方案，说明他们准备怎样

使用我们将向他们提供的美元。与此同时，他们必须在本国银行存入一笔价值相等的当地货币。在征得我们同意后，这笔款项可以用于他们国内复兴和改建项目中不需要使用外汇的部分。总之，这笔钱可以用两次——一次是以美元从美国或其他地方购买欧洲买不到的设备或原料，另一次是在受援国内部作为当地货币使用。每年都要做出详细的计划，这对某些小国是很困难的。法国、联合王国、德国和意大利有能力去做。至于其他国家，则一般不具备关于这方面的专门知识。总之，对许多欧洲小国来说，马歇尔计划是一所经济计划的学校。这是把欧洲各国联合起来的一所学校和一次实验。很多欧洲国家至今还认为，美国反对或曾经反对过欧洲的统一。在那个阶段，我们对欧洲的全部援助几乎只有一个目标，即逐步达到欧洲统一。当时在欧洲，是一个伟人辈出的时代。法国的罗贝尔·舒曼，出生于卢森堡，他曾作为一个德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后来当了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还有康拉德·阿登纳这位大人物，他领导德国从战败国的灰烬中挣脱出来，使它在世界文明国家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在意大利，有阿尔奇德·德·加斯贝利，他的政治生涯是从当一名奥地利议员开始的，那时他是奥地利帝国意大利少数民族的代表。在一些小国家里也有若干位大人物，如比利时的保罗·亨利·斯巴克。哈里曼同这些人物的关系都很密切。哈里曼善于处理各种问题，为人正直，有能力使美国政府了解当时的需要并往往能够办成，因而使人们对他充满信心。这的确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要做的事很多，但也出了不少伟人，并有坚强的意志。

我回想起有一次同哈里曼先生到埃森的情景。一路上，到处都是废墟，战争的破坏这么严重，使我十分吃惊。我们走访了一家德国人，他们住在地下室。我们同他们进行了简短的交谈，离开那里后，我对哈里曼先生说：“你看他们能重建家园吗？”他说：“能，他

们作得到。”我又说：“什么东西使你这样肯定呢？”他说：“你看到那个地下室的桌子上放着什么东西吗？”我回答说：“我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盆花。”哈里曼先生说：“对！任何一个民族，当他们处在这样凄惨的境地，还能想到在桌上摆设一些花，就一定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我必须承认，那时我曾认为，即使我能活到很大年纪，也不能看到欧洲的繁荣和重建。但是，不到十年功夫，人们已经很难发现战争的痕迹了。

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瘫痪，生产几乎完全停顿。在一个国家，即希腊，实际上还在进行着军事冲突。那时的希腊正处于共产主义邻国和希腊共产党的内外夹攻之中。希腊的内战消耗着它的精力，并使这个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恢复得很慢。一九四九年元旦，我曾同哈里曼先生一起到过雅典。他似乎有一种在假日旅行的嗜好。无论在感恩节，还是七月四日国庆节，或者元旦，我们几乎总是陪他在某个地方旅行。他是一个不知疲倦和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他满腔热情地致力于同我们友好的欧洲国家的自由、统一和复兴事业。有一次，我们乘飞机去雅典，到那里正遇到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就在我们到达前不久，希腊内务部长在雅典城里的闹市区被人暗杀了。因此，为我们采取了严密的安全措施。这时，白天在雅典城外走动需有警卫随同，夜晚则根本不能出城。希腊的许多领导人不会讲英语，但会讲法语，因此，当哈里曼先生同他们进行会谈时，我就可以对他有所帮助。

在希腊，经济问题不是压倒一切的紧迫问题。紧迫的问题是，得到外国支援的共产党游击队在全国各地进行袭击，以及政府为对付这种袭击所需要的军事援助。对此，杜鲁门先生总是采取非常慷慨的态度，不仅运去了军事装备，而且还派了一批美国军官去援助希腊军队，抵御该国遭到的咄咄逼人的威胁。哈里曼先生同希腊经济协调部长斯蒂法诺斯·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会谈时，我

替他当翻译。会谈结束后，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约我到离雅典城不远的普西希霍的彭泰利康饭店去见他，我同意了。当时，我和另一位执行马歇尔计划的同事住一个房间，他的名字叫格伦·穆尔豪斯。就在我即将出门应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之约，共进午餐之前一刹那，我突然想起一个美国新闻记者在萨洛尼卡被人谋杀的案件，人们发现他的尸体在海湾上漂浮，脑袋后面还有一个子弹穿过的窟窿。于是我就闪起一个念头：这次邀请，也可能是某种圈套。我有一枝手枪，我决定随身带着它，这样，如果我去的话，至少不至于象一只面对屠刀的绵羊那样任人摆布。我在床上把手枪拆卸开来，擦干净。然后把它重新装起来，可是，装到最后一道工序，也就是把枪管塞进手枪里边去时，我想不起来怎么装了。因为发现时间不早了，我就越来越着急，拚命想把它安装好。最后我知道已来不及把它装好，因为这时响起了敲门声，一个柔和的声音说：“我是乔治尤斯·达斯卡拉基斯。我是来接你出去的。”我对同屋的伙伴说：“仔细瞧瞧这个家伙。我们也许只能从他那里知道个究竟。”说完这句话，我就把还没有装好的手枪塞在枕头底下。达斯卡拉基斯先生把我带到楼下，我上了一辆旅行汽车，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后面坐着两名士兵，在我们驶出城外进入郊区后，我随时准备着一支手枪的枪口凉嗖嗖地抵着我的脖颈。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走进彭泰利康饭店，同斯蒂法诺波罗斯先生一起喝茶并进行了长谈。他的真正意图是要我使哈里曼先生理解这样的事实：希腊是马歇尔计划国家中处境最困难的一个国家，事实上战斗正在希腊土地上进行，广大地区被控制在共产党游击队手里，因此，形势比其他国家紧迫。所以，在取得援助方面，希腊应该比其它国家享有更大的优先权，因为其他国家并不存在类似的情况。我离开这个饭店刚几分钟，就想起来怎样装好那枝手枪的最后一道工序，但已经无济于事，因为手枪在我房间里的枕头底下。当我回

到寓所时，穆尔豪斯告诉我，旅店的女仆曾进来整理床铺，他指着我的床叫她先整理。当时，希腊正实行戒严令，照理，谁要是拥有武器，就要判处死刑。这位女仆已经走到我的床边，正掀开枕头准备收拾时，看到了手枪，她发出一声尖叫就飞快地跑了，再也没有回来收拾床铺。这件事现在听起来也许有点可笑，但在当时，情况就是如此，也就是说情况很棘手也很困难，因此，女仆显得那样激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哈里曼先生在希腊逗留期间，总有一批警卫或侦探跟随着他，所以，当他到机场准备乘飞机离开希腊时，他转过头向我小声说：“借我点钱给巡警。”我断定他这样说没有贬意。这是他想起来形容警务人员的第一个词。我问：“你要多少？”他哦了一声说：“不知道，给我五十万德拉克马^①吧。”这在当时折合美金一百五十元。我必须说，不管是什么钱，能借给哈里曼先生五十万元，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后来，他把这笔钱还给了我。

有一次当我离开巴黎外出旅行时，我被推选为欧洲合作署的活动委员会主席。这样，我就需要进行大量的社交组织工作，并需要同已经成立的准备接受和沟通马歇尔计划援助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②发生联系。当时我们搞过的一项活动，是为救济法国的小儿麻痹症患者组织一次庆祝罗斯福生日的舞会。为了寻找这类性质的慈善机关，我们作了大量调查，最后终于找到了。于是马歇尔计划部门的高级官员的夫人们，以及高级官员本人都纷纷亲自出马，同那些平时有事务往来的各界人士接触和联系，请他们捐献物品，以便义卖后充当该项救济的基金。史亚巴莱丽香水公司捐了一套服装，法国航空公司捐了两张飞机票，其他许多商业公司也都捐献了各种五花八门的东西。我们曾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办理这件

① 希腊币名。——译者

② 一九六〇年改名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译者